

日本人的“中国观”

徐志成, 刘 宁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深入探讨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如何将中日关系引向健康、合理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多次变迁。纵观日本人的“中国观”,是以日本国内环境变化为基础,并结合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深入剖析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在新世纪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观”;特点;中日关系;变迁

中图分类号: B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08)01-0052-04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 30 年了,这 30 年来涉及中日关系的各种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负责这些问题的当事人的新老交替也十分明显。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1](p166)}发表后的 10 年里,“历史认识问题”没有成为日中双方的重要议题,经济合作问题也没有成为重大议题。虽然,在外交上,围绕象征着反苏战略的“反对霸权主义”,两国间有过深刻的争论。但是,在总体上,“中日友好氛围”在日本大为高涨,“中国热”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日本人的对华感情也极为良好^[2]。

但是进入了 21 世纪的今天,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阶段”的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我们纵观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也可以说成是日本人对“中国观”的变化历史,正是因为其观念的变化才引起日本对中国政治、外交战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并引导其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至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三次变迁

我们要了解日本人的“中国观”,首先要分析其近代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

本人的“中国观”曾发生几次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立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

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开始于公元 607 年,即从小野妹子派遣遣隋使开始。当时的中国作为天朝大国,同其他的周边国家一样,也把日本纳入到“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之中。而日本最初虽然没有自觉到“华夷秩序”的真正内涵,但也按照朝贡体系的行为要求,积极派遣使节,主动寻求与中国的接近。但到了唐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想与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在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就是鲜明的例子。随着日本民族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不仅挑战中国的“华夷秩序”,甚至要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称朝鲜为“西藩”,以示其民族的优越。后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蔑视进一步发展,由称中国为“邻国”变为“藩国”^[3](这种变化可视为其“中国观”的第一次变迁),并于 894 年干脆终止

收稿日期: 2007-10-01

作者简介: 徐志成(1980-),男,河北张家口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为中日哲学比较。

① 沈 旧唐书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第 5340 页。

派遣遣唐使。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中断。

9~13世纪,以中国长江中下游为中心,民间通商活动迅速展开,人员、物品的交流及金融业的发展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导致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重组。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外闭锁政策与排外意识还在持续^{43](p25)}。到了平清盛时代(1118~1181年),以博多港为中心,日宋贸易得到积极推动。宋朝货币大量流入日本,取代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实物货币。“镰仓时代”(1192~1333年),宋钱(即宋朝的铜钱)占据主导地位。清盛所开拓的中世流通经济为日本纳入东亚铜钱经济圈创造了契机,其历史意义不可小视^{44]}。进入室町时代(1338—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划时代的变化。1373年明朝使节团被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重新开始外交。明朝永乐皇帝授予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日本又被重新纳入到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义满、义持、义教三位将军都曾接受中国皇帝所派册封使的正式册封。义政、义澄、义晴也都使用过“日本国王”这一封号。幕府将军受到册封“意味着属于天皇的外交权被武家政权所夺取”^{45](p38)},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权力结构。不过,这个国王称号在日本国内的正式场合并不使用(这种变化可视为其“中国观”的第二次变迁)。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是,日本人的天皇其实没有正式的被册封,而是他的将军。这说明日本表面返回了“中华文明圈”,实际上是为了发展它的经济。

进入15—16世纪,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当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还存在着一个西方世界时,以往的三元国际观“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开始向“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国际观转化。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明王朝,并在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丰臣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拒绝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不过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

格局的基本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挑战,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整合。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惟一的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这种变化可视为其“中国观”的第三次变迁)。这时日本人的“中国观”是:日本开始蔑视中国,视中国为“半野蛮国家”和“亚细亚之恶友”。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失败,日本不顾西方的入侵而进行着扩张国权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展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需要联合亚洲,扩展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近代日本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中构筑着他的亚洲观与“中国观”。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可视其为发生了几次大的变迁。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波峰方向发展(认同),而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谷底方向发展(不认同)。表现出明显的“实力主义”、“现实主义”价值取向。

二、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通过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三次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对于中国的观念,并不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基于日本本国国情的需要,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不同的变化,其宗旨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也正是在这种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到了现代,这种变化依然持续。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在日本人眼中重新确立大国形象,他们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样的中国认识就发生了变化。进入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社会却在动荡与混乱中渡过了10余年左右的时光。日本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了近代的原点上。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日本从亚洲借鉴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亚洲的中国在这一时期却变化甚微。

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跟着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在亚洲推行他的‘新战略’,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的作用。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即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过于衰弱。从历史上看,中国过于衰弱,日本就会面临危机。中国过于强大,日本似乎又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国内往往会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中国观’。其中,既有对中国强大后市场需求的渴望,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日本在研究和看待中国时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如NHK(N.H.K是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台机构,创办于1925年)在做过有关中国的节目后,有关负责人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力排除想掌握这个国家整体形象的野心,我们只想挑战局部地区’。中央公论也认为,任何人所了解的中国都是个别印象,想通过一件事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小室直树在《中国原论》中指出,正视中国的历史才是理解中国的宝库,佛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是拯救个人的,但儒教是拯救集体的。几十年来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及友好人士对中国脚踏实地的研究以及实事求是的观察为日本人新的‘中国观’奠定了基础。

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向首相提交了《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报告书,将该报告书可被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日本人‘中国观’又将变迁的信号,它体现了日本人‘中国观’变化的新特点

三、新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特点

1、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

‘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来处理日中关系。虽然该文件没有把中国像美国那样定位在‘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上,但却认为‘与中国的关
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同时,将中日关系定性在‘协调与共存’、‘竞争与磨擦’两种相反要素相互交织的框架之中。主张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冷静的心情’加以对待。对于双方的‘共同点’要加

以扩展,对于‘差异点’双方也要有勇气承认。认为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也有利于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

‘对于日本来说,究竟希望近邻的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呢,是一个经济陷入停滞、时而发生猛烈社会动荡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商机的中国?这一点无需讨论’。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机遇。关于日本经济‘空心化’问题,报告书承认这是事实,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程度有加深的可能,但并不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指出,解决经济空心化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其作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中的一个环节,‘使日本自身在高附加价值的生产活动中成为有魅力的国家并推进广义上的服务化’。而‘胡乱地强调对中国的受害意识毫无意义。与其如此,还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国’,走与中国共存共荣的道路,进而推进面向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日中合作这一目标的实现’。

3、肯定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

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书认为,日本与中国的‘磨擦’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看成是‘对日本的中长期深刻威胁’。说‘特别是最近,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游弋,给日本国民带来了不安’,中日双方有必要积极开展安保对话,加强军队之间的交流以及军舰的互访。关于‘日台关系’,该报告书认为,‘自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变化很大,日台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是自然的事情’。这就为日本继续涉足台湾事务埋下了伏笔。

4、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看法

历史问题是中日相互认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报告书呼吁应尽快从‘历史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主张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不应任由歪曲历史的现象继续下去,尤其是日本领导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国以及近邻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鲁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增进对日本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中国国内青年人‘厌日情绪’的增长,要求日本政府就中国国内的教育方式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坦率的协商。并期待中国能通过教育及媒题为改善未来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并向中国

人民介绍战后日本是如何排除走军事大国道路而将所余之力用于支援亚洲各国发展经济的。

总之,在《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中所体现出的日本人的新中国观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误解的成份。但总的看来积极的成分占主导地位。未来的中日关系绝不是谁附属谁的问题,而是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共同发展的问题。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不论是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是中国人的‘日本观’都存在着误区。究其原因,既有因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所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因在交流中产生的误解。更重要的是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无疑会捆住日本人民的手脚,同时也会给中日关系投下阴影,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以及中日两国人民相互认识中的最大障碍。日本没有真正解决是把中国作为战略伙伴还是战略对手的问题。就日本人的‘中国观’而言,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在亚洲保持‘光荣孤立’,还是放下包袱与亚洲真正地融为一体,共同开创亚洲的美好未来。相信中日两国都会更加注重从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追求双方价值观上的共同点,走出双方认识上的误区,携手共进,与亚洲几国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多次大

的变迁。每一次的变迁,都表现出明显的‘实力主义’、‘现实主义’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其规律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如:在大唐衰落后发生的第1次变迁;在大明鼎盛期发生的第2次变迁;在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发生的第3次变迁以及未来的20年中所发生的第三次变迁,都证明了或即将证明这一规律性特点。

参考文献:

- [1] 谢寿光. 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 [日] 天儿惠. 等身大的中国[M]. 东京: 劲草书房出版社, 2003.
- [3] [日] 片仓穰. 日本人のアジア观[M]. 东京: 明石书店, 1998.
- [4] [日]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M].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2.
- [5] [日] 井上秀雄. 古代日本の外国观[M]. 东京: 学生社, 1991.

[责任编辑 张克军]

The Japanese ‘Outlook on China’

Xu Zhicheng and Liu 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Province 133002, China)

Abstract: A further study of the Japanese ‘outlook o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y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over 2000-year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Japanese ‘outlook on China’ undergoes a series of changes. The outlook varies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osition of strength’, ‘pragmat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 first’. Thus,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Japanese people’s eyes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an outlook on China, featur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ange